

# 章太炎的學佛因緣

蔡惠明

章太炎（一八六九—一九三六）名炳麟，字枚叔，是近代著名的思想家、文學家與政治家。他對佛教有過甚深因緣，在思想上受佛教的影響也很大。

章太炎早年走的是封建學者的道路。他埋頭讀孔孟著作有十多年，也研究古代中國的多種學說，却始終未找到思想的出路，苦悶彷徨，不知遁從。他的學佛，最初受夏曾佑等的影響，看些《法華經》、《楞嚴經》、《涅槃經》等，尚未深造。後來被捕入獄，讀經始勤。在其「自述學術次第」中，他寫道：

「遭禍繫獄，始專讀『瑜伽師地論』及『因明論』、『唯識論』，乃知『瑜伽』爲不可加。既東遊日本，提倡改革；人事繁多，而暇讀藏經，又取『楞伽』及『密嚴』誦之，參以康德、蕭賓何之書，益信玄理無過『楞伽』、『瑜伽』者。」

這可說是他尋求真理的重要發現。他在『荆漢微言』中，又寫下了研究佛學的心得，說：

「吾輩說佛學與沙門異撰。入道階位，非親自證得者不說；爲我們革命道德上起見，也是重要。」

在客居東京期間，章太炎會以大乘佛法詮釋「齊物論」，他寫道：

「齊物者一律平等之談，詳其實義，非獨等視有情，無所優劣，蓋離言說相，離名字相，離心緣相，畢竟平等，乃合齊物之義。……若其情存彼此，智有是非，雖復說愛兼利，人我畢足，封畛已分，乃奚齊之有哉？可謂破名相之封執，等酸鹹於一味。」這與華嚴之旨，法相主意，吻合無間。他還寫道：

「近人或言：自『世說』烏目山僧宗仰爲作『後序』出，人心爲之一變，自『華嚴』出，人心又爲之一變。今太炎之書見書，將爲二十年來儒墨九流，破封執之局，引未來之的，新震旦衆生知見，必有一變以至道者。」由此可見他對佛法折服的程度，已備受感化了。

章太炎在他的著作中，還經常引用佛經，來論證各種學術的概念。如在「菌說」這篇科學論文中寫道：

「佛家謂人身自頂至踵，自髓至膚，有八萬戶蟲，四頭四口，九十九尾，形相非一。一尸復有九萬細蟲，小於秋毫。」《寶積經》云：初出胎時，經於七日，八萬戶蟲，從身而生，縱橫食啖，令身熱惱，生有憂愁。《僧伽經》云：人將死時，諸蟲怖畏，互相啖食，受諸苦痛，男女眷屬，生大悲惱。」這是引佛經以說明有關人生的現象概念，論證細菌活動與人精神現象的關係。

章太炎曾與宋平子一起問學於清末佛學權威楊仁山（文會）居士。他在『瑞安孫先生傷辭』中稱讚平子：

「疏通知遠，學兼內外，治釋典，喜『寶積經』。炳麟少治經，交平子始知佛藏。……最後乃一意治『瑜伽』。炳麟被繫，專修無著、世親之說。比出獄，世無應者。聞平子治『瑜伽』，竊自喜，以爲梵方之學，知微莫如平子，視天台、華嚴諸家深遠。」

當時受楊仁山居士講學影響的還有康有爲、譚嗣同、梁啟超、汪康年、夏曾祐等。他們的治學方法都很精嚴，也可說是得力。

於法相、唯識、因明學的研究。但是章太炎與譚嗣同的「仁學」觀點存在分歧，「怪其雜糅」，主張以唯識「微生滅」（量變）的理論作爲改良主義理論的根據，並強調「意識斷則我相除，我相除則異同泯，異同泯則平等出。至於平等，則洞徹彼此，一塵不隔，爲通人、我之極致矣。」

章太炎晚年主持「章氏國學講習會」，得事講學，兼談佛法，影響很大。著名文學家魯迅也常常去聽講，並因此激發了他對佛經研究的興趣。魯迅在章太炎逝世後曾寫過『章太炎先生二三事』、『再記章太炎先生』等文稿敘述其事。據『魯迅日記』載：民國三年，魯迅看了『瑜伽師地論』、『翻譯名義集』、『肇論畧註』、『大唐西域記』、『玄奘法師傳』、『高僧傳』等佛教經書。他還與好友許壽裳相約，合作共購佛經。在讀了『瑜伽師地論』、『翻譯名義集』、『閱藏知津』等書後，魯迅對許壽裳說：「釋迦牟尼真是大哲，他把平常對於人生難以解決的問題，早給我們啓示了，真是大哲。」（許壽裳：『亡友魯迅印象記』）像這樣的例子尚有很多。當時學林還以聽章太炎講佛學爲論談中心，可見其影響的廣泛，也說明章太炎在弘揚佛法上起過一定的作用。

遺憾的是：章太炎學佛僅在於理論的研究，沒有結合修行實踐，這使他終於「入寶山而空返」，未能深露佛法的利益。當然他也不可能大徹大悟，明心見性，或者仗佛慈力，往生淨土。他的佛學思想，由於不能解行並進，扎根於信，而失去了支柱。最後他講習的「國學」，竟成爲儒、釋、理學的大雜謬，在歷史上一閃而過。這是名士學佛的通病，應當引以爲戒，堅決矯正的。

我們認爲，像章太炎的佛學啓蒙老師，楊仁山居士那樣的「上求佛道，下化衆生，解行一致，精進不息！」的願行，才是通向菩提大道的正途。章太炎一生中反復較多，有時也發表與佛法背道而馳的主張，正反映了他的「徒有其表，恰無其實」的本質，是不足取的。